

## 摘要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调控经济运行、调节收入分配、监督经济活动的重要功能。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我国最为主要的纳税主体。然而，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为了增加利润，会开展一系列的盈余管理活动，企业所得税作为一项重要盈余支出，自然也会被企业关注，由此引发了企业避税。

在理论研究方面，有关避税对企业的影响，逐渐从传统观点转变为避税的代理观，即企业避税并没有实现企业价值的提升，反而给管理层提供了谋取私利的机会，为企业带来了效率损失。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管理层的个人特征由其是工作经历对企业避税有较大的影响。税务背景作为管理者个人工作经历的种类之一，相较于其他的职业背景，与企业的避税程度存在更紧密的联系。那么，高管税务背景与企业避税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内在联系？

本文构建虚拟变量高管税务背景，将税务背景定义为税务局、税务师事务所、其他税务公司的工作经历，研究高管税务背景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在被解释变量避税的衡量指标中，本文既使用了以实际所得税税率为重点的 TME，也使用了以会计税收差异为重点的 BTD、DDBTD。基于烙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本文分别形成了高管的风险规避观和寻租观，并依据这两种观点，在理论分析中提出了相应的假设。从风险规避观来看，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会基于对声誉风险和道德风险的规避，抑制企业的避税；而从寻租观来看，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开展避税活动的成本较低，能促进企业的避税。

基本回归的结果表明，高管税务背景对企业避税具有抑制作用，并且该抑制作用在不同产权性质、不同税收征管强度、高管年龄不同的企业中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税务背景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是基于高管对风险规避的机制实现的，并且，高管税务背景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因此，本文有理由认为，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基于风险规避的机制，抑制了企业的避

税，提升了企业的价值。此外，本文的基本回归结果通过了替换解释变量、排除同期政策干扰的稳健性检验。最后，本文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政府和企业这两个层面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企业避税；税务背景；高管；烙印理论**

# Abstract

Tax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tate's fiscal revenue and has important function of regulating economic operation, regulating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supervising economic activities. In a market economy, enterpris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tax payers in China. However, in order to increase profits in the course of business, enterprises will carry out a series of surplus management activities, and corporate income tax, as an important surplus expenditure, will naturally be paid attention to by enterprises, thus giving rise to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ax avoidance on enterprises, there has been a gradual shift from the traditional view to an agency view of tax avoidance, i.e.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does not achieve an increase in corporate value, but instead provides management with opportunities for personal gain and brings a loss of efficiency to the enterprise. Based on the Upper Echelons Theory and Imprinting Theory, a growing number of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the personal characteristics of management, including work experience, have a great impact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ax background, as one of the types of managers' personal work experience, is more closely linked to the degree of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han other professional backgrounds. So what i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executive tax background and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dummy variable executive tax background, defining tax background as work experience in tax administration, tax firms, and other tax companies,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executive tax background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o ensure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the measure of the explanatory variable tax avoidance, this paper uses both TME, which focuses on the effective income tax rate, and BTM and DDBTM, which focus on accounting tax differences. Based on the Imprinting Theory and Principal-agent Theory, this paper forms the risk-averse view and rent-seeking view of executives respectively, and

based on these two views, two different theoretical analyse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risk-averse perspective, executives with a tax background will discourage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based on the avoidance of reputational and moral risks, while from the rent-seeking perspective, executives with a tax background will engage in tax avoidance activities at a lower cost and will promote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he results of the basic regression indicate that the tax background of executives has a disincentive effect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and the disincentive effect is heterogeneous across firms with different property rights, different tax administration intensity and different ages of executives. It is further found that the effect of executive tax background on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is based on the mechanism of risk avoidance by executives, and that executive tax background is conducive to the enhancement of corporate value. Therefore, it is reasonable to argue that executives with tax backgrounds discourage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based on risk-averse mechanisms and enhance the value of the firm.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of basic regression in this paper pass the robustness test of replacing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excluding the interference of contemporaneous policies.. Finally,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the study, the paper makes recommendations at both government and corporate levels.

**Keywords: Corporate Tax Avoidance; Tax Background; Senior Manager;  
Imprinting Theory**

# 目录

1 引言.....	1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3
1.2.1 研究思路.....	3
1.2.2 研究方法.....	5
1.3 研究创新点.....	5
2 文献综述.....	7
2.1 企业避税的相关研究.....	7
2.1.1 企业避税的经济后果.....	7
2.1.2 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	8
2.2 高管职业背景的相关研究.....	10
2.3 高管职业背景与企业避税的相关研究.....	11
2.4 文献评述.....	12
3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4
3.1 理论基础.....	14
3.1.1 委托代理理论.....	14
3.1.2 高层梯队理论.....	15
3.1.3 烙印理论.....	16
3.2 研究假设.....	16
3.2.1 风险规避观.....	17
3.2.2 寻租观.....	18
4 实证研究设计.....	20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20
4.2 模型设计.....	20
4.3 变量定义.....	21
4.3.1 被解释变量.....	21

4.3.2 核心解释变量 .....	22
4.3.3 控制变量 .....	22
4.3.4 分组变量 .....	24
4.3.5 拓展变量 .....	24
4.4 描述性统计 .....	26
4.4.1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	26
4.4.2 分样本描述性统计 .....	27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	29
5.1 基本回归结果 .....	29
5.2 稳健性检验 .....	31
5.2.1 替换变量 .....	31
5.2.2 排除同期政策干扰 .....	32
5.3 异质性分析 .....	35
5.3.1 产权性质 .....	35
5.3.2 税收征管强度 .....	37
5.3.3 高管年龄 .....	39
5.4 拓展性分析 .....	41
5.4.1 风险规避检验 .....	41
5.4.2 企业价值检验 .....	43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	46
6.1 研究结论 .....	46
6.2 政策建议 .....	48
6.2.1 政府层面 .....	48
6.2.2 企业层面 .....	49
参考文献 .....	51
致谢 .....	58

# 1 引言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调控经济运行、调节收入分配、监督经济活动的重要功能。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我国最为主要的纳税主体。然而，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为了增加利润，会开展一系列的盈余管理活动，企业所得税作为一项重要盈余支出，自然也会被企业关注，由此引发了企业避税。

以往的观点认为，企业避税将财富从政府转移到企业，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Wilson, 2009; Blaylock, 2016; 李成等, 2016）。随着委托代理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委托代理的角度研究企业避税，发现企业避税给管理层和大股东提供了谋取私利的机会，给股东带来了效率损失，财富从国家转移到股东的假设在数据中没有得到验证，企业价值并没有得到真正提升（Chen and Chu, 2005; Desai and Dharmapala, 2009）。此外，学者研究发现了企业避税许多方面的负面影响，例如，避税提升了上市公司股价崩盘的风险（江轩宇, 2013），降低了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姚立杰等, 2018），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企业的声誉（Dyreng et al., 2016; Austin 和 Wilson, 2017）。

1984年，Hambrick and Mason 提出高层梯队理论，认为管理层并非绝对理性，且其个人特征会对企业决策和绩效表现产生重要影响。基于高层梯队理论，Marquis and Tilcsik 在 2013 提出了烙印理论，认为高管的过往经历会形成相关“烙印”，对高管的认知、价值观产生持续的影响。关于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的文献，聚焦于宏观经济政策和企业微观层面，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税收执法、税会差异、金融发展等，企业微观层面则主要包括规模大小、薪酬激励、政治关联、外部审计等公司特征。而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复杂程度的逐渐提高，高管个人认知的局限性逐渐凸显。结合高层梯队理论和高阶理论，学者们逐渐发现，高管并非是同质的，高管的个人特征会影响其在公司的

自由裁量权，进而影响企业的避税水平（Dyrenge et al., 2010）。从此，关于高管个人特征对企业避税影响的研究在学界引发热潮。

目前关于高管个人特征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学者们关注较多的高管特征包括年龄、籍贯、性别、教育水平、工作经历等等（曾爱民等，2019；Shen Y et al., 2019；Wen et al., 2020）。在上述个人特征中，对高管的思维模式和认知能力影响最大的，是高管的工作经历（文雯等，2019）。刘华等（2012）和 Chen et al.（2020）研究发现，高管的会计背景有利于企业避税。Law 和 Mills（2017）分析从军背景的 CEO 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发现从军经历的 CEO 具备更高的政府忠诚度和更严格的道德约束，不会采取激进的避税手段。还有学者关注到，具有审计背景的高管会利用自己的职业优势，如信息优势、人脉优势等，提高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刘继红，2018）。

税务背景作为管理者个人工作经历的种类之一，相较于其他的职业背景，与企业避税存在更紧密的联系，但目前关于高管税务背景的研究较少，对于高管税务背景的定义也局限于高管在税务局的工作经历，而忽略了高管在税务师事务所、其他税务公司的工作经历。因此，本文扩展了高管税务背景的定义，研究高管税务背景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基于风险规避观和寻租观，本文提出相关假设。

在风险规避观下，高管税务背景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可以从声誉和社会责任这两个角度解释。在声誉方面，企业避税给企业、管理者自身的声誉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Austin 和 Wilson, 2017），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为避免企业避税对企业、对自身声誉的损害，会相应减少企业的避税行为。在社会责任方面，企业的发展重心正在逐渐从股东利益最大化转变为利益相关者的财富最大化（Inger 和 Stekelberg, 2022），企业在承担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的同时，还承担了社会责任与道德责任，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在企业社会责任潜移默化地影响下，更加倾向于遵守商业道德、积极投身社会事业，从而自发地规避企业避税引起的道德风险。

在寻租观下，高管税务背景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可以从身份便利性和避税成本这两个角度解释。从身份便利性的角度来看，由于长期工作、生活的积



累，税务背景的高管在税务圈子里拥有更多的人脉，更容易发动自身的人脉关系，与税务局的税务人员建立信任，开展寻租活动（李吉园等，2020）。从避税成本的角度来看，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更可能也更容易识别并利用税法的漏洞设计出复杂、隐蔽的交易，同时还能利用自身对财经领域相关法律的了解，为自身和公司减轻法律上的惩罚，也就是说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能在避税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开展寻租活动，为企业降低税负。

综上所述，通过阐释高管的税务背景对公司避税的影响，本文以避税这一具体的财务决策为例，对 Hambrick 和 Mason（1984）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Marquis 和 Tilcsik（2013）提出的“烙印理论”增添了来自中国的经验佐证。基于高管职业背景的视角，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深化相关的研究。具备税务工作经历的高管往往具有更深刻的税务认知、或者具有更充足的避税经验，但现有研究对税务背景高管的关注较少。本文基于风险规避观和寻租观，分析高管税务背景对企业的避税程度的影响，不仅能够丰富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文献，还可以丰富基于管理层角度的公司治理的文献，具备一定的理论意义。

在实践意义上，本文为当前深化公司治理的改革和当前税收征管制度的完善提供了更加具体的方向。对于企业而言，通过研究高管税务背景对企业税收激进性活动的影响，有助于完善我国公司治理制度，缓解委托代理问题，减小经营风险，加强内部控制，帮助企业在健康的营商环境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对于政府部门而言，通过分析高管税务背景与企业税收激进性的关系，有利于寻找税收征管的侧重点，完善税收征管法律制度，提高纳税人遵从度，防止国家税收收入的流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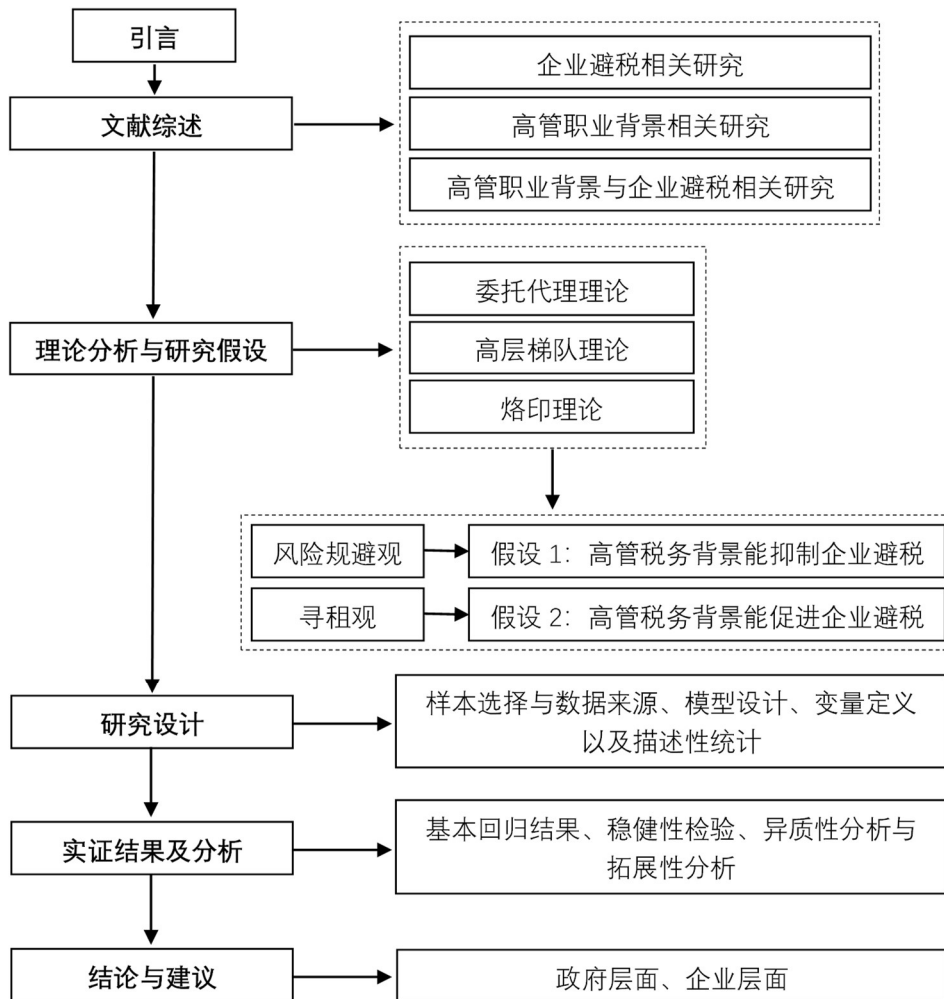
## 1.2 研究思路和方法

### 1.2.1 研究思路

如图 1-1 所示，本文的研究思路整理如下。通过梳理相关的文献，整理企业避税相关研究、高管职业背景相关研究、高管职业背景与企业避税相关研

究的研究现状。基于“委托代理理论”、“高层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本文提出风险规避观、寻租观这两个观点，假设高管税务背景对企业的税收激进性的负面影响。在研究设计部分，本文对样本、变量、模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同时汇报了描述性统计的结果，确保数据和模型的合理、合规。实证结果部分，本文汇报了基本回归结果，并对此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基于基本回归的结果，本文开展异质性分析和拓展性分析。最后，针对上述研究结果，立足于减税降费的制度背景，紧密结合我国实际，在企业层面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在政府层面对税收的征管提出建设性建议。

图 1-1 研究思路图



## 1.2.2 研究方法

(1) 文献研究法。本文利用中国知网、Elsevier ScienceDirect、Springer E-Journal 电子期刊等数据库提取中外文献资料，通过大量阅读并系统梳理相关国内外文献，对研究现状有初步的把握，借鉴现有的研究成果，分析高管的税务背景对企业避税产生影响的理论基础。

(2) 实证分析法。本文从国泰安数据库获取高管税务背景、企业避税程度等变量的相关数据信息，在 Stata 统计软件的辅助下，运用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深入探究高管税务背景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为本文的研究结论提供实证依据。

## 1.3 研究创新点

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

第一，从税务背景切入，研究高管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拓展了有关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往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宏观经济政策和企业微观层面对企业避税的影响。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复杂程度逐渐提高，管理者个人认知的局限性逐渐凸显（潘孝珍和陈侨东，2021），越来越多的学者研究发现，管理者的人口统计特征特别是过往的工作经历在决定企业避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Dyreg et al., 2010）。研究发现，高管的会计背景、审计背景有利于企业开展避税活动，降低企业实际税率（刘华等，2012；Chen et al., 2020；刘继红，2018）；而高管的军事背景、海外背景会抑制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Law 和 Mills, 2017；雷倩华等，2020）。税务背景作为管理者个人经历种类之一，相较于其他的背景如会计背景、军事背景、审计背景等，与企业避税存在更紧密的联系，但目前关于高管税务背景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的研究内容丰富了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有关研究。

第二，分析了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影响企业避税的路径，为企业避税的研究提供了风险规避的视角。本文基于风险规避观，提出了高管税务背景能抑制企业避税的假设，同时在拓展性分析中检验了风险规避的路径。具有税

务背景的高管会基于对声誉风险、道德风险的规避，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高管与企业之间形成了声誉共同体，共同承担声誉受损带来的代价（李焰和王琳，2013），企业避税在给企业的声誉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同时，也为高管带来了声誉负担，增大了高管的声誉风险。此外，随着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担当诉求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企业在落实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的同时，将社会责任潜移默化地转移给了高管，因此企业避税将导致高管道德风险的上升。本文通过对风险规避的深入挖掘，为企业避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风险规避视角，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也为抑制企业避税提供了解决机制。

第三，拓展关于高管税务背景的定义，丰富了高管税务背景的有关研究。少部分学者研究了税务背景中的税收征管经历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但高管的税务背景并不仅仅局限于高管曾经的税收征管经历，税务工作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事务所、部分学术团体中也有所体现，因此税务背景应该包括高管在税务局、企业、事务所及其税务学术团体的任职经历。此外，在少有的董事税务征管经历与企业避税的研究中，学者们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的认为具有税收征管经历的董事能指导企业获得计税依据优惠，为企业争取宽松的税收征管尺度，从而提高企业的避税程度（赵纯祥等，2019）；有的则认为董事的税收征管经历会加深其对避税风险的认知，出于对企业和自身的声誉的珍惜，企业的避税程度会得到降低（潘孝珍和陈侨东，2021）。

## 2 文献综述

### 2.1 企业避税的相关研究

#### 2.1.1 企业避税的经济后果

在众多的关注企业避税的经济后果的文献中，学者们逐渐形成了传统观、代理观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代彬等，2016）。

避税的传统观视企业避税为财富的转移，即对于企业而言，企业避税是一种价值增加活动。学者们认为避税有利于股东财富和企业价值的增加，因为合理有效的避税节约了公司税负，能提高公司的税后净利润；同时，公司开展避税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支出负担，增加企业的库存流动资金，从而促进公司的进一步生产和投资（Blaylock, 2016；李成等，2016）。

随着委托代理理论的发展，学者们逐渐形成了避税的代理观。避税的代理观认为，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避税行为会给企业带来效率损失（Chen and Chu, 2005），企业避税给管理层和大股东提供了谋取私利的机会，并不一定会提高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刘笑霞和李明辉，2018；Desai and Dharmapala, 2009）。有学者研究发现，当企业处于较低的治理水平状态时，企业避税反而会损害企业的价值（王静等，2014）。由于代理成本的存在，管理层的避税行为更多地反映管理层的私人利益，会为企业增加非税收成本，降低避税对企业价值的提升作用（田高良等，2016）。

无论是传统观还是代理观，现有文献都考虑了避税活动的风险及其负面影响。避税活动往往游离于法律的边缘，避税程度过高会引起税务监管部门的关注，从而提高公司的法律与监管风险，并间接提高审计师的法律与监管风险（刘笑霞和李明辉，2020）。当企业的避税程度较高时，审计师将提高审计收费（赵国庆，2014；陈冬和罗祎，2015），发表更多的非标准审计意见（钱春杰和周中胜，2007；陈冬等，2019），甚至作出退出客户业务的决定（Goh et al., 2013；刘笑霞等，2019）。江轩宇（2013）研究发现，企业的避税行为

给管理层寻租提供了充分的隐蔽性，增加了上市公司股票市场的风险。姚立杰等（2018）研究发现，随着企业避税程度的提高，企业的举债能力不断减弱，债务成本不断上升。Austin 和 Wilson（2017）研究发现，品牌的价值对公司的避税有影响，品牌价值较高的公司避税较少，因为在品牌价值较高的企业，消费者对企业的声誉更为关注，而企业避税对自身的声誉的损害是不可逆的。Dyrenng 等（2016）证明，维权团体的公众监督导致公司减少对避税天堂子公司的依赖。

### 2.1.2 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

企业的避税程度是成本和收益相权衡的结果（江轩宇，2013）。关于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的文献聚焦于宏观经济政策和企业微观层面，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税收执法、税会差异、金融发展等，企业微观层面主要包括管理层个人特征、高管激励、寻租、政治关联、外部审计、媒体关注等。

随着税收征管力度的提升，政府在税务检查中发现企业避税行为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江轩宇，2013）；范子英和田彬彬（2016）认为国税局长异地交流的制度有利于降低政企合谋的程度，提升税收执法的独立性，从而降低企业的逃税水平；孙雪娇等（2021）以金税三期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发现当企业避税动机越高时，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于降低企业盈余管理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税会差异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体现在，随着税会差异程度的增加，企业避税程度提高（Chan et al., 2010）；国家间、地区间的税法差异会促使企业跨国或跨地区转移收入、费用和利润，从而最大程度地规避税收（Johannesen, 2014）。从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看，一方面，融资渠道的增加会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降低税收规避的边际收益；另一方面，外部融资对企业信息质量要求的提升，增加了税收规避的成本，因此金融发展会降低企业的税收规避动机（刘行和叶康涛，2014）。

随着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复杂程度逐渐提高，管理层个人认知的局限性逐渐凸显（潘孝珍和陈侨东，2021），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管理层个人在决定企业避税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Dyrenng et al., 2010）。从管理层的学术经

历来，文雯等（2019）认为，管理人员的学术经历有利于自身的自律性和道德责任感的提高，从而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从管理层的籍贯来看，李吉园等（2020）认为拥有本地 CEO 的企业的避税程度更低，因为个体情感和社会舆论会促使本地 CEO 合理纳税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从管理层的性别来看，曾爱民等（2019）从性别这一人口统计特征切入，研究高管性别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得出的结论是：女性 CEO 出于对风险的规避、以及对自身道德标准的要求，会抑制企业的激进税收行为，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

避税产生的现金流成为高管薪酬的替代或补充，增加高管的薪酬，公司的避税程度会显著下降（陈冬和唐建新，2012）；但也有部分研究发现，对管理层的薪酬激励可以显著增加企业的避税程度（Armstrong et al., 2012）。征纳双方合谋引起的企业逃税也受到了学界的关注，田彬彬和范子英（2018）研究发现，企业的寻租性贿赂支出促进了征纳双方的合谋，并进而导致企业逃税的增加；张敏等（2018）研究发现，企业的寻租成本受政企机构间地理距离的影响，这意味着，随着企业与税务局之间距离的缩短，企业寻租成本减小，企业的避税程度提高。企业与政府想要建立政治关联，最简单、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或者将具有政治背景的官员雇佣为企业高管。目前的研究普遍认为，企业的政治身份能够产生避税效应，即实际控制人为前任或现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府任职官员的企业，具有更高的避税程度。

（罗党论和魏翥，2012；李维安和徐业坤，2013）。从外部审计的角度，Chow et al.（2018）的经验分析表明，大型审计公司的存在有助于降低企业逃税的可能性；但也有研究认为，审计师通过直接提供税务服务，帮助客户通过避税获得收益（魏春燕，2014），外部审计公司的特定税收行业专业知识在其客户的避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McGuire et al., 2012）。媒体关注对企业的税收激进行为起到了监督作用，田高良等（2016）认为，媒体关注对企业避税的抑制效果，是通过增加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成本实现的；刘笑霞和李明辉（2018）发现，媒体负面报道通过加大企业避税行为的监管成本、声誉成本，减少避税为高管带来的额外收益，从而抑制高管的激进避税行为，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

## 2.2 高管职业背景的相关研究

高管，即高级管理人员（Top/Senior Manager）。国内外学者对于高管的表述存在差异。吴文锋等（2009）仅把董事长、总经理定义为高管，而陈春华等（2019）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党委书记；Cannella et al.（2008）认为高级管理人员只包括那些职位高于副总裁、在公司董事会任职的人员；但 Schmid 和 Mitterreiter（2020）只定义董事会成员为高管。还有学者将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一起称为高管（潘孝珍和陈侨东，2021；张天宇和邓雅双，2022）。以上国内研究的高管数据都来源于 CSMAR 数据库，而根据 CSMAR 数据库的定义<sup>①</sup>，高管的范围并不仅限于董事会、副总裁、总经理，也不包含董事与监事。

“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管并非是完全理性的，由于受到个人视野和选择性认知的限制，高管会依据自身的认知模式和价值观念进行战略选择，因而管理者的个体特征会对企业决策和绩效表现产生影响（Hambrick 和 Mason，1984）。“烙印理论”指出，特定阶段的环境特征将对个体或组织产生重大影响——个体和组织将打上环境特征的烙印，且这种烙印将持续影响个体和组织的行为，不会轻易消失（Marquis 和 Tilcsik，2013）。可以看出，烙印理论是高层梯队理论的具体化，深入探讨了高层梯队理论中的管理者经历对其认知与价值观的影响（杜勇等，2019）。

在高管的性别、年龄、籍贯、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等个人特征当中，高管的思维模式和认知能力的建立和发展，受工作经历的影响会更大（文雯等，2019）。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税务背景的高管，但目前关于税务背景高管的研究非常少，因此在文献综述部分，本文主要分析不同职业背景的高管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刘浩等（2012）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的银行背景对提升企业的举债、融资能力是有利的。Benmelech 和 Frydman（2014）认为军人背景的 CEO 更加强

---

<sup>①</sup> 具体定义见子库“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高级管理人员包含（副）总经理、（副）总裁、CEO、（副）经理、董秘、总监和年报上公布的其它管理人员。



调责任、奉献和自我牺牲，他们倾向于较低的投资和研发、不使用过度的杠杆，公司也不太可能卷入欺诈。具有技术背景的高管，会通过显著促进研发支出与技术人员投入、专利数量与技术人员产出等增进企业的技术效率（韩忠雪等，2014），抑制企业金融化投资（王维和胡铮，2022）。具有金融背景的 CEO 更了解金融理论、能更好地与外部投资者沟通和筹集资金（Custódio 和 Metzger, 2014），能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增加创新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陈乾等，2020），还会通过提高 CEO 自信程度和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金融化（杜勇等，2019）。Schmid 和 Mitterreiter（2020）认为个人经历的不同会对董事会成员之间的行为整合和互动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拥有国际工作经验的董事在公司的任期会缩短。刘婷等（2019）研究发现，独立董事运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成熟经验，为公司“出谋划策”，增加公司的盈余操纵行为，降低公司的盈余质量。张天宇和邓雅双（2022）认为具有财务背景的高管对信息质量有较高的要求、有较强的风险规避意识，会更加倾向于选择国际四大来提高企业的治理水平。

### 2.3 高管职业背景与企业避税的相关研究

基于政治关联理论，吴文锋等（2009）认为，具有政府工作经历的高管，积累了很多人脉关系和社会资源，能够更加方便地与政府部门建立“关联”，因此企业更有可能获得范围更广、幅度更大的税收优惠。

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高管职业背景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刘华等（2012）研究发现，高管的会计背景与公司的有效税率负相关，即高管的会计工作经历会抑制企业的避税；而 Chen et al.（2020）研究了具备会计专长的 CFO 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 CFO 的会计专长有利于企业避税。Law 和 Mills（2017）分析从军经历的 CEO 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发现从军经历的 CEO 具备更高的政府忠诚度和更严格的道德约束，不会采取激进的避税手段。还有学者关注到之前担任过企业外部审计师的高管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发现此类高管会依据他们的信息

优势、关系优势和有关客户的特有税收，增大企业的税收规避程度（刘继红，2018）。此外，在国外工作或学习过的高管和董事，对企业的社会责任、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有更深刻的理解，能够减少企业的激进税收行为（雷倩华等，2020；Wen et al., 2020）

有学者关注到了具有税收征管经历的董事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但目前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赵纯祥等（2019）研究发现，聘请了税收征管经历独董的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低于会计利润的程度更大，即具有税收征管经历的独董能通过指导企业获得计税依据优惠、为企业争取宽松的税收征管尺度的方式为企业带来更低的实际税负。但是潘孝珍和陈侨东（2021）却认为，基于对避税风险和避税成本的认知、对企业和自身声誉的珍视，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税收征管经历能有效地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且在越大的税收征管力度、越高的金融市场化程度、越好的法制环境下，企业避税的抑制效果越明显。

## 2.4 文献评述

通过整理近年来众多学者研究企业避税、高管职业背景的文献，本文梳理出以下逻辑。

现有文献中对于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政策和企业微观层面，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税收执法、税会差异、金融发展等，企业微观层面主要包括高管激励、寻租、政治关联、外部审计、媒体关注等，管理层作为公司的决策者，其个人特征对企业税收激进性的影响也逐渐成为了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但是，目前对管理层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对于高管职业背景影响企业税收激进性的研究还不够充分。

关于高管职业背景的文献主要聚焦于公司决策和经营业绩上的影响。学者们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发现，高管的银行、军事、技术、财务等背景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盈余质量、金融化投资、信贷融资和外部审计等都存在重要影响。然而，鲜有学者关注高管的税务背景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特别是高管的税务背景对企业避税程度的影响。此外，目前的研究

并未详细区分高管的类别，存在将高管、董事和监事混为一谈的现象，为确保数据的稳健性，本文按照 CSMAR 数据库中的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库的定义，严格区分董事、监事和高管。

在少有的税务背景董事与税收激进性的研究中，学者们得到了两种不同的结论，有学者认为税务背景董事与企业避税程度呈现正相关，有些反之。究其原因，可能是对于企业避税的度量不够全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采用三种方法衡量企业避税程度：企业名义税率与有效税率之差 TME、会计一应稅收益差异 BTD、扣除应计项目影响的会计一应稅收益差异 DDBTD。此外，目前对于高管税务背景的定义局限于高管在税务局征管的工作经历，而忽略了高管在税务师事务所、其他税务公司的工作经历。但高管的税务背景并不仅仅局限于高管曾经的税收征管经历，税务工作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事务所、部分学术团体中也有所体现，因此税务背景应该包括高管在税务局、企业、事务所及其税务学术团体的任职经历。

## 3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3.1 理论基础

#### 3.1.1 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是公司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委托代理理论研究的是研究委托代理关系的理论,在这种关系中,两方通过合同建立了关系,雇佣方需要服务方提供服务,并赋予服务方一定范围内的决策权利,服务方获得的报酬与自身的服务数量、服务质量密切相关。在公司治理层面,委托代理关系可以进一步细化,雇佣主体指的是公司的所有者,而服务主体指的是公司的经营者。公司所有者以公司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公司经营者却以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按照委托代理理论,在信息不对称时,由于公司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存在有关利益目标的冲突,经营者常常以损害公司利益为代价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传统的观点认为,企业避税降低了企业的税负,提高了企业的净利润,同时增加了企业的留存现金,实现了财富从政府到企业的转移,对企业价值的提升是有正向促进作用的(Blaylock, 2016; 李成等, 2016)。但随着委托代理理论在公司治理层面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从而逐渐形成了避税的代理观。避税的代理观认为,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避税行为会给公司或股东带来效率损失,因为高管开展避税活动的目的大多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会给公司或股东增加非税收成本,从而降低传统观点下避税对公司价值的提升作用,即企业避税给管理层提供了谋取私利的机会,掩盖了管理层实施利益侵占的事实,并不一定会提高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Chen and Chu, 2005; 田高良等, 2016; 刘笑霞和李明辉, 2018; Desai and Dharmapala, 2009)。

目前关于企业避税的研究为委托代理理论提供了诸多经验证据。研究发现,避税活动助长了管理层的寻租行为,企业避税程度越高,管理者过度投资

的现象、在职消费的现象越严重,企业股价崩盘风险越大,债务融资能力下降得越多,债务成本增加得越多(江轩宇,2013;姚立杰等,2018;王静等,2014)。当企业的避税程度较高时,审计师将提高审计收费(赵国庆,2014;陈冬和罗祎,2015),发表更多的非标准审计意见(钱春杰和周中胜,2007;陈冬等,2019),甚至作出退出客户业务的决定(Goh et al.,2013;刘笑霞等,2019)。

### 3.1.2 高层梯队理论

高层梯队理论又称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由Hambrick和Mason在1984年提出,在高管研究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管并非是完全理性的,高管的认知能力和价值观等心理特征受其生理特征、个人经历等人口统计特征的影响;当高管依据自身的心理特征部署公司发展战略时,高管的个人特征就对公司的发展方向和绩效表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高层梯队理论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1)企业的战略决策反映了高管的心理特征;(2)高管的心理特征能通过高管的年龄、学历、工作经历等人口统计特征反映;(3)公司的战略决策及绩效表现受高管的人口统计特征影响,同时也受高管团队之间互动的影 响。高层梯队理论提出之后,因其运用便于定量获取并测量的人口统计特征来反映高管的内部心理特征,为高管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由此引发了高管研究的热潮(程贯平和刘海山,2009)。

目前,学界普遍关注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高管任期、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工作经历等等。不少学者关注女性参与高管团队、高管的年龄以及高管团队的职能背景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魏立群和王智慧,2002;任颀和王峥,2010;王雪莉等,2013)。部分学者研究高管权力水平、高管的海外经历、高管的从军经历对企业审计质量的影响(权小锋等,2018;董彦良,2020;张宇扬和许海晏,2020)。还有研究关注高管性别、高管学术经历、高管海外经验对企业避税的影响(曾爱民等,2019;文雯等,2019;Wen et al.,2020)。这些研究证明了高管的人口统计特征对其认知能力和价值观的影响,从而显著地解释了高管的人口统计特征对公司战略决策和绩效表现的影响。

### 3.1.3 烙印理论

烙印理论 (Imprinting Theory) 指出, 特定阶段的环境特征将对个人或组织产生重大的影响——个人或组织将被打上环境特征的烙印, 这种烙印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轻易消失, 也不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逐渐消逝, 反而能够持续影响个人或组织的行为。在烙印理论模型中, 存在三个关键要素: (1) 敏感期, 指在特点的环境中存在的敏感期; (2) 烙印, 指个人或组织在敏感期形成的与环境相匹配的烙印; (3) 持续影响, 指烙印对个人或组织的持续影响。

可以看出, 烙印理论是高层梯队理论的具体分支, 重点探讨了高管的工作经历这一类人口统计特征对公司战略决策和绩效表现的作用。基于高层梯队理论和烙印理论, 越来越多学者开始关注不同工作经历的高管对公司技术效率、创新效率、全要素生产率、避税程度的影响。一些学者研究发现, 具有技术背景的高管能提高企业的技术效率, 因为高管的技术背景有利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增加, 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增加 (韩忠雪等, 2014; 王维和胡铮, 2022)。而具有金融背景的 CEO 更了解金融理论、能更好地与外部投资者沟通和筹集资金, 能显著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增加创新水平从而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还会通过提高 CEO 自信程度和缓解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金融化 (Custódio 和 Metzger, 2014; 陈乾等, 2020; 杜勇等, 2019)。具有从军背景的高管更加强调责任、风险和自我牺牲, 具备更高的政府忠诚度, 不会采取激进的避税手段 (Benmelech 和 Frydman, 2014; Law 和 Mills, 2017)。

本文重点关注高管税务背景对企业避税的影响, 认为高管在税务局、税务师事务所或是其他税务相关岗位的工作经历会给自身带来不可磨灭的烙印, 从而产生与税务行业相匹配的认知、提高与税务行业相匹配的工作能力, 进而影响公司的税务决策, 对公司的避税程度产生一定影响。

## 3.2 研究假设

税务背景的高管拥有丰富的税务经验, 能够清晰地认识到企业避税的风险与收益, 在企业税务决策的过程中, 既有可能识别并规避激进的避税行为

招致的风险，也有可能利用自身的专业能力开展寻租活动。据此，本文提出风险规避观和寻租观这两种观点。

### 3.2.1 风险规避观

根据烙印理论，高管的税务工作经历给其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相较其他职业的工作经历，税务工作经历给高管带来更强的税收风险甄别能力，以及更深刻的避税潜在风险的认知（赵纯祥等，2019）。企业的避税行为直接导致了国家财政资金的流失，实质上是企业将自身的经营成本转移给国家，具有不负责任、不道德的负面色彩，并且企业的避税活动可能会招致税务机关的稽查，对企业和高管个人都会带来负面影响（文雯等，2019）。

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会规避由于避税引起的企业及其自身声誉损害的风险。高管与企业形成了声誉共同体，共同体之间共同承担声誉受损带来的代价（李焰和王琳，2013），企业避税在给企业的声誉带来严重负面影响的同时，也为管理层带来了声誉负担。在品牌价值较高的企业中，消费者对企业的声誉更为关注，为避免企业避税对其自身声誉的损害，企业会减少避税行为的发生（Austin 和 Wilson，2017）。若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违反了法律法规并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下，企业的社会形象将大受打击，企业的声誉将受到严重损害。同时，税务高管也难辞其咎，个人的未来发展如薪酬、升职、跳槽等都将受到阻碍。为了避免不可挽回的错误的发生，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会更加重视企业的税务合规事项，避免税收激进行为的发生，督促企业依法纳税。此外，对于长期参与税务工作的人而言，企业高管的位置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在企业中，税务部门往往只是财务部门的其中一个分支，只有在超大规模的企业中才存在税务高管。出于对自身高管职位的珍惜，税务背景高管会倾向于维护公司和个人的声誉，规避与自己所在岗位密切相关的税务风险。

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承担着社会责任，会自发地规避企业避税引起的道德风险。股东理论的观点在于，企业只对股东负责，要确保股东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在 2019 年，将近两百家大型公司的 CEO 在美国商业圆桌会议上签署《公司宗旨宣言书》，宣称公司的首要任务是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该

宣言书对现代企业的经营和发展具有很强的启示性，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管理者不再将股东理论奉为圭臬，而是开始关注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财富最大化，即企业是一个包含客户、员工、社区、媒体、政府部门的整体生态系统，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充分考虑并满足所有个体的需要（Inger 和 Stekelberg, 2022）。在我国，企业在负有经济责任、法律责任的同时，也承担着社会责任与道德责任。随着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担当诉求的不断扩大和深化，管理层对于企业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有了全新的、明确的指引。这意味着，企业在落实利益相关者财富最大化的目标的同时，将社会责任潜移默化地转移给了高管。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在承担社会责任的情况下，更加倾向于遵守商业道德、积极投身社会事业，从而自发地规避企业避税引起的道德风险。

在风险规避观点下，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会规避企业避税招致的声誉风险和道德风险，企业的避税程度会由此降低。

### 3.2.2 寻租观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高管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使下，会选择更有利于其自身谋取私人利益的公司决策，而避税活动既能通过增加企业现金流为高管谋取私利提供来源，又能通过增加公司内外部的监管难度为高管谋取私利提供掩护（代彬等，2016）。研究发现，避税对管理层的寻租具有反哺效应（Desai 和 Dharmapala, 2006；陈冬和唐建新，2012）。一方面，企业避税具有较高的隐蔽性、较强的复杂性，企业避税行为越多，高管的寻租行为就越容易藏在避税行为的阴影下，难以被公司内部或外界发现。另一方面，高管通过寻租行为谋取的自身利益越大，高管在公司层面实施避税决策的意愿和冲动就越强烈。

高管的税务背景便于其开展寻租活动。与非税务背景的高管相比，由于长期工作、生活的积累，税务背景的高管在税务圈子里拥有更多的人脉。税务相关工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不可替代性，因此从事税务工作的人往往能够一直待在税务工作圈。此外，税务工作的性质注定了税务工作人员在不同单



位之间的工作往来或工作流动，企业的税务人员、事务所的税务人员、学术团体中的税务专家、税务局的税务人员，在工作中都会相互交流并建立人际关系。我国是典型的“关系型社会”，身处税务圈子的高管，更容易发动自身的人脉关系，与税务局的税务人员建立信任，开展寻租活动（李吉园等，2020）。

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开展避税活动的成本较低。首先，税务背景的高管本身具备系统的税务知识、严谨的税务思维和丰富的税务从业经验，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下，更可能也更容易识别并利用税法的漏洞，从而设计出复杂、隐蔽的交易，开展寻租活动，为企业降低税负。其次，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除了拥有丰富的税务经验，通常还具备会计、审计、法律等相关知识，能够利用自己对财经领域相关法律的了解，为自己和公司规避或减轻法律上的惩罚，或是有效地为自己和公司辩护从而推卸责任，降低避税成本。最后，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能利用自己的人脉优势，为企业争取宽松的税收征管尺度（赵纯祥等，2019），扩大企业的避税空间，减轻企业的避税成本。

在寻租观点下，高管的税务背景能为寻租提供人脉关系以及成本上的便利，企业的避税程度会由此提高。

综合上述风险规避观和寻租观的观点，本文提出假设 1：高管税务背景能抑制企业避税。

## 4 实证研究设计

### 4.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借鉴李吉园等（2020），为避免 2008 年企业所得税改革对数据可比性的影响，本文将样本期间的起始年份选为 2009 年；同时为了避免新冠疫情给企业税负带来的影响，本文将样本期间的截止年份选为 2019 年。因此，本文的样本选取为：2009 年至 2019 年全部 A 股上市公司。

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数据依次做如下预处理：（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 ST、\*ST、PT 股、退市整理期的上市公司样本；（3）剔除高管个人简历、所得税费用、利润总额、名义税率等数据缺失的公司样本；（4）借鉴刘笑霞和李明辉（2018），剔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大于 1 的样本，同时剔除实际税率小于 0 或大于 1 的样本；（5）为避免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上下 1% 的 winsorize 缩尾处理。其中，高管的税务背景信息是通过手工整理高管个人简历中披露的高管过往经历得来的。最终本文得到 18746 个样本观测数。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 CSMAR 数据库。

### 4.2 模型设计

本文构建如下的回归模型来识别高管税务背景对企业避税的影响。

$$TAXAVOID_{i,j,t} = \beta_0 + \beta_1 TAXBG_{i,j,t} + \beta_2 CONTROL_{i,j,t} + YEAR_t + IND_j + \varepsilon_{i,j,t} \quad (1)$$

其中，i 表示个体，t 表示年份，j 表示行业。

$TAXAVOID_{i,j,t}$  表示企业的避税程度。

$TAXBG_{i,j,t}$  为高管税务背景的虚拟变量，若企业在某年拥有税务背景的高管的数量大于 0，样本赋值为 1，否则为 0。

$CONTROL_{i,j,t}$  代表控制变量合集。

借鉴文雯等（2019），为了控制行业和宏观经济变动对企业避税研究的影响，在模型中控制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其中， $YEAR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IND_j$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sup>②</sup> $\varepsilon_{i,t}$ 为残差项。

## 4.3 变量定义

### 4.3.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避税程度。衡量企业避税程度的指标有两类，一类以企业的实际所得税率为重点，另一类以企业的会计、税收差异为重点（刘行和叶康涛，2013）。借鉴李成等（2016），本文采用 TME、BTD、DDBTD 这三个指标来衡量企业的避税程度。

第一类指标主要指的是 TME<sup>③</sup>。TME 指企业名义税率与有效税率之差，其中有效税率用所得税费用减去递延所得税费用后的差额除以税前利润表示，名义税率则是指法定税率。TME 的值越小，说明企业名义税率与有效税率之间的差异越小，企业的避税程度越低。

第二类指标包括 BTD 和 DDBTD。BTD 是指会计、税收差异，用税前利润减应纳税所得额后除以上年资产总额表示，其中应纳税所得额用所得税费用减递延所得税费用后除以名义税率表示。DDBTD 是指扣除应计项目影响的会计、税收差异。BTD 或 DDBTD 的值越小，说明企业的会计税收差异越小，企业的避税程度越低。DDBTD 需要根据 BTD 和 TACC 计算，其中 TACC 用净利润减去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的差额除以资产总额表示，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BTD_{i,t} = \beta TACC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DDBTD_{i,t} = \mu_i + \varepsilon_{i,t}$$

<sup>②</sup> 本文未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原因主要在于：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高管税务背景，在回归中的波动主要是个体之间的差异导致的，控制个体固定效应可能会过滤掉个体之间的有用信息；同时，参考目前类似研究的文献，普遍控制的是时间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sup>③</sup> 第一类指标还包括有效税率 ETR，考虑到有效税率受企业税收优惠的影响较大，本文只采用 TME 作为衡量企业避税程度的第一类指标。

### 4.3.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虚拟变量：高管税务背景，定义如下：

按照 CSMAR 数据库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数据表，高管的职位主要包括经理级别、总裁级别、主管级别、CEO、董事会秘书等职位<sup>④</sup>。由于相同名称的职位在不同的公司可能具有不同的等级，简单以名称来判断高管的任职情况可能不够严谨，故本文对高管的识别以 CSMAR 数据库中标注的职务类别编码为准。职务类别编码共有十位数，其中第三至六位数表示高级管理层任职情况，上述高管任职情况用职务类别编码表示分别是 30、31、32、33、34、35、36、37、38 和 39。由此，本文区分了高管与其他任职人员。

税务背景是指具有与税务相关的任职、工作经历。根据国泰安数据库披露的高管个人简历，本文手动检索高管个人任职、工作经历中与税务相关的部分。通过手动的检索、整理与总结，在本文中，高管的税务背景可以分为以下几类：（1）曾经工作于专业税务机构，包括税务局、税务师事务所、税务咨询或代理公司；（2）曾经担任与税务相关的职位，如从事于公司税务部、税政科、税务筹划部、税务管理部，或担任公司税务专员、税务经理、税务总监等；

（3）曾经具有税务学术团体的工作经历，包括税务学会、国际税收学会、纳税人协会等；（4）简历中未说明具体职务，但有税务经历的相关文字表述，如负责公司税务、在税务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等等。

根据上述对高管、对税务背景的定义，若企业当年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数量大于或等于 1，则 TAXBG 取值为 1，否则为 0。

### 4.3.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陈冬和唐建新（2012）、曾爱民等（2019），引入了以下控制变量：

（1）企业规模（SIZE）：本文用企业资产总额的对数表示。一般情况下，

---

<sup>④</sup> 具体来看，高管指的是：总经理、副总经理、经理、副经理、总裁、副总裁、董事会秘书、负责人、主管、副主管、顾问、CEO、总监和其他。

规模越大的企业，税务筹划的意识越强、税务筹划的能力也越强，如聘请专业的税务工作人员、合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进行节税。因此，本文预测企业规模越大，企业避税程度越高。

(2) 资产负债比例 (LEV): 本文用负债总额除以资产总额表示。资产负债比例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企业的负债情况。若企业的 LEV 过高，说明企业存在较高的财务风险，易引起税务部门的关注，而税务局的关注度越高，企业的避税行为越容易被发现。因此，本文预测企业 LEV 越高，企业避税程度越低。

(3) 无形资产比例 (IASSET): 本文采用无形资产净额除以资产总额的比例衡量。研究发现，无形资产在计提减值准备、计算年度摊销额等会计操作中存在避税的可能。因此，本文预测，企业的 IASSET 越高，避税程度也越高。

(4) 固定资产比例 (PPE): 本文采用固定资产净额除以资产总额的比例表示。一般来说，企业的固定资产比例越低，资产流动越快，企业的经营能力就越强。若企业具有更高的营运能力，税务筹划的空间也越广，企业越有可能开展避税活动。因此，本文预测，企业的 PPE 越高，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

(5) 总资产净利润比例 (ROA): 本文用净利润除以资产总额的比例表示。总资产净利润比例能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企业的盈利能力，一般来说，企业的盈利水平越高，对税务筹划的关注度会越高，税务筹划的意愿也更强烈。因此，本文预测，企业的 ROA 越高，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

(6) 营业利润增长比例 (GROWTH): 本文用营业利润较同期的差额除以上年同期金额的比例衡量。企业的营业利润增长比例反映了企业的成长能力，企业的高营业利润增长比例往往与企业的高成长能力密切相关。而成长能力强的企业，往往有较高的资金需求，财务风险很可能随之提高，从而促使企业开展避税活动。因此，本文预测，企业的 GROWTH 越高，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

(7)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本文用企业当年股东持股比例的最大值表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反映了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在股权集中度较

高的企业，控股人更加希望企业能够稳定地、可持续地发展，因此会更加关注公司的合规程度，极有可能避免激进的避税行为。因此，本文预测，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避税程度越低。

#### 4.3.4 分组变量

(1) 产权性质 (SOE): 按照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本文设置虚拟变量 SOE，将国有企业样本赋值为 1、民营企业样本赋值为 0。

(2) 税收征管强度 (TAXDIR): 金税三期工程极大地提高了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能力 (樊勇和李昊楠, 2020)。随着金税三期工程的逐步推行，越来越多的研究以企业所处地区是否上线金税三期工程作为衡量税收征管强度的指标。本文设置虚拟变量 TAXDIR，企业当年所属省市上线金税三期的样本赋值为 1，未上线金税三期的样本赋值为 0<sup>⑤</sup>。

(3) 高管年龄 (AGE): 首先计算公司高管的平均年龄，用高管年龄总和除以高管总人数表示；然后根据公司高管平均年龄的中位数，将样本一分为二。企业高管平均年龄大于或等于整体平均年龄中位数的，样本赋值为 1，低于中位数的样本则赋值为 0。

#### 4.3.5 拓展变量

(1) 违规处理 (VIOLATION)。国泰安数据库中的违规处理子库收集了企业公告、媒体报道以及监管机构的公告，披露了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企业的违规类型具体包括：内幕交易、操控股价、推迟披露、重大遗漏、虚假陈述、未缴或少缴税款等等。本文将聘任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前，上市公司违规行为被披露的次数大于 0 的样本赋值为 1，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被披露的次数为 0 或数据缺失的样本赋值为 0，同时将聘任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后上市公司的违规情况统一赋值为 0。

---

<sup>⑤</sup> 借鉴张克中和欧阳洁 (2020)，将“金税三期”单轨上线的时间视为试点时间，并将下半年上线的地区视为从下一年度开始试点；同时，深圳市和青岛市的企业按照实际实施的时间确定变量。

(2) 市场价值 (TobinQ)。借鉴王雪莉等 (2013), 用托宾 Q 值衡量企业的市场价值, 托宾 Q 值等于市值除以资产总额, 其中市值用股权市值与净债务市值的总和表示。公司的市场价值能反映企业的经营情况, 与企业的长期绩效相关。

表 4-1 相关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解释
被解释变量	企业避税程度	TME	名义税率-(所得税费用-递延所得税费用)/税前利润
		BTD	(税前利润-应纳税所得额)/上年资产总额
		DDBTD	扣除应计项目影响的会计-税收差异
解释变量	高管税务背景	TAXBG	企业当年具有税务背景的高管数量 $\geq 1$ , 取值为 1, 否则为 0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log)	SIZE	$\ln(\text{资产总额})$
	资产负债比例	LEV	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无形资产比例	IASSET	无形资产净额/资产总额
	固定资产比例	PPE	固定资产净额/资产总额
	总资产净利润比例	ROA	净利润/资产总额
	营业利润增长比例	GROWTH	(营业利润本年金额-营业利润上年同期金额)/营业利润上年同期金额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TOP1	企业当年股东持股比例的最大值
	年份	YEAR	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行业	INDUSTRY	控制行业固定效应	
分组变量	产权性质	SOE	国有企业取值为 1, 否则为 0
	税收征管强度	TAXDIR	企业当年所属省市上线金税三期的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高管年龄	AGE	高管平均年龄 $\geq$ 整体平均年龄中位数的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拓展变量	违规处理	VIOLATION	上市公司违规行为被披露的次数大于 0 的样本, 赋值为 1; 被披露的次数为 0 或数据缺失的样本, 赋值为 0
	市场价值	TobinQ	用托宾 Q 值衡量企业的市场价值, 托宾 Q 值=市值/资产总额, 其中市值=股权市值+净债务市值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347056015042006035>